

太平洋人類學學術訪問之旅

黃應貴*

這次能有太平洋之行，主要是國科會的「人類學門赴澳洲、斐濟及夏威夷考察訪問」計畫的關係，得以與其他四位同是研究南島民族的同仁（蔣斌、黃宣衛、陳文德、與童元昭），一起訪問與南島（語）民族研究有關的幾個重要教學研究單位：(1)坎培拉的澳洲國立大學(ANU)太平洋與亞洲研究院的人類學系；(2)斐濟蘇瓦的南太平洋大學之大洋洲藝術與文化中心及太平洋發展及統治進階研究所；以及(3)Manoa夏威夷大學的人類學系。這次訪問考察，除了希望能藉機讓英語世界多少瞭解台灣的南島民族研究而吸引他們的注意外，也希望能與相關教學研究機構發展出進一步的長期合作關係，開展出與台灣以外地區南島民族的比較研究，以提升台灣相關領域的研究水準，並尋求未來研究可發展的方向，以便對國際學界提供獨特的貢獻。下面是我個人對於這次行程的經驗與感想。

一、大國的大視野：ANU的體驗與感想 (27/10-2/11, 2007)

我們第一站來到澳洲坎培拉，我與澳洲國立大學人類學系主任Mark Mosko原本就認識，在他積極的推動與協助下，我們最後決定利用這次機會舉辦一個有關台灣南島民族研究的工作坊，題目訂為CHANGE AND CONTINUITY IN THE ABORIGINAL SOCIETIES OF TAIWAN。同時利用澳洲人類學會(AAS)舉行年會的時間(30/10/07-2/11/07)，舉辦同一題

具有先進環保概念的建築：澳洲國會大廈
(建在土丘裡而使得屋頂成為草地)。

* 作者為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研究員

目的小組討論會(panel discussion)。因此，這次澳洲之行重點反而擺在參與學術討論。事實上，這也是澳洲（甚至是英語世界）第一次以台灣原住民為主題組成工作坊或小組討論會（順益基金支助下的會議除外）。它一開始就展現了澳洲人寬廣的視野與企圖。

在工作坊上，除了我們的論文，像我的“Cultural Formation and Recreation in the Chenyoulan River Region from 1895 to the Present”、蔣斌的“Articulation of Hierarchies: House, Community and Value among the Paiwan”、黃宣衛的“Cultural Construction and a New Ethnic Movement: The Name Rectification Campaign and the Fire God Ritual of the Sakizaya in Eastern Taiwan”、陳文德的“Incorporating the Foreign as the Autochthonous: An Ethnographic Study of the Puyuma People of Eastern Taiwan”、以及童元昭的“Fa-Amu(‘To Feed’): Adopting Tahitian Children, and Becoming Tahitians?”外，還包括了葉淑綾的“The Encompassing Kinship System of the Austronesian-speaking Amis of Taiwan”及James J. Fox的“The Critical Evidence of Taiwanese Relationship Terminologies within the Austronesian Language Family”等屬於ANU成員的論文。由於參加的聽眾多半是與亞太研究機構有關係的學生與老師，還算有些聽眾而不至於冷場。加上主持人Mosko教授認真讀過我們事前給他的文章，因此還頗能夠帶動一些相關討論，而能有效串場。但由於Mosko教授未能有機會充分提出他自己的觀點及評論，事後我與他討論後，第二天他將他所寫的評論影印發給我們每一位，以供11月1日AAS年會小組討論會的參考。雖然，他對每一篇文章的討論重點都不一樣，卻有共同的興趣與立場：他都是從親屬角度，試圖從每一篇文章中找到與大洋洲民族誌研究有關的課題，使得台灣南島民族的民族誌能與大洋洲研究上的關懷連接起來。這立場其實已充分表現在他的學生葉淑綾視男子年齡會成爲一種親屬組織的論文上。而工作坊所突顯的問題，在1日的小組討論會上更爲明顯。

相對於工作坊，在AAS年會上的小組討論會，參與的聽眾顯然少得多。除了原有的聽眾已聽過而缺席外，一方面也因爲大會同一時段有六個小組討論會同時進行，因而分散了聽眾。加上大會的主題是Transforming Economies, Changing States，我們這個小組討論會的主題與大會主題（特別是論文本身）並不緊密關連，更加不易吸引人。不過，最主要的原因還是台灣的南島研究，基本上過去並沒有與國際學界對話，也尚未發展出獨特的研

究課題（如印度研究的subaltern studies）來吸引英語世界的學者注意，參與討論的學者，基本態度上還是與Mosko教授類似：以大洋洲的研究關懷來看台灣南島民族誌可能具有的意義。比如，當他們聽到黃宣衛談撒奇萊雅所創造的火神祭時，有人馬上聯想到大洋洲民族誌中火與水等二元象徵體系相關的問題上。他們顯然把台灣的南島民族想成與太平洋地區相類似的情境中。因此討論到最後，當Mosko特地問我，當代情境中台灣南島民族的現象是否有其特殊性？既有研究觀念理論有何限制？我便不客氣地說，不能忘記一個歷史事實，台灣的南島民族與漢人接觸已超過三百年，許多文化現象已不能單純視為與大洋洲南島民族平行存在。像撒奇萊雅所創造的火神祭，火的觀念實來自漢人。另一方面，我們若一直停留在過去的知識而不能找到新的理論觀念，恐很難面對當代新自由主義全球化情境下的新現象。像黃宣衛有關已被官方正式承認的撒奇萊雅族如何成爲一個新的族群之討論，除了他們在實踐他們自己所創造出的儀式時，其他的日常生活都沒有改變。他們大部分還是與阿美族人住一起、講阿美族話等。這樣，我們還稱他們爲一個族群嗎？至少，我認爲這「族群的活動」只是一個特殊區域性活動之發展，族群認同(ethnicity)其實是用來爭取經濟及政治利益的符碼，是一種文化資本。若一直停留在過去族群的概念，實無法理解當代的現象。結束時，Mosko表示這是perfect ending。那天晚宴，我拿一個小禮物給安排議程的負責人Alan Rumsey教授，表達我們對於議程調動頻繁所帶給他的困擾之歉意時，他卻對我說我最後講的話讓他印象深刻。

雖然如此，我由這次ANU的經驗裡獲得幾個教訓。第一，下次在國外舉辦這類以台灣南島民族的研究爲主題的工作坊或研討會，必須更有系統地組織，才能有效突顯台灣南島民族研究的特色。尤其這次我們發表的論文屬於正在進行而未完成的研究，品質及系統性不足，無法有效突顯台灣南島民族及研究上的特色。第二，要讓英語世界的學者容易進入我們的研究與討論中，正如Mosko教授的企圖，最好能與大洋洲民族誌比較，使他們更易知道台灣南島民族與大洋洲民族誌的共同點與可能連結。第三，台灣南島民族的研究必須找到獨特而有理論意涵的研究課題，才容易引起西方學者的興趣與注意。第四，這次參加AAS的研討會，由於我們自己要發表論文而沒有心情及時間去聽其他題目的演講與討論，可能因而錯失了許多有用的新思考與新想法，實是一大損失。尤其是這次澳洲人類學大會的主題，Transforming

Economies, Changing States，實際上是以全學會的力量來處理新自由主義下有關的政治經濟問題，不僅是當前全世界（包括台灣在內）都面對的現實問題，更在理論上有可能突破的新切入點。而在台灣的學界，除了像我這樣的少數人外，此議題一直不受重視。故這也是我們瞭解它未來在學術上可能發展的好機會，卻因我們自己要發表論文而錯失了進一步瞭解別人如何面對這問題的機會，使得我個人覺得這次澳洲之行，因未能在這課題上得到新的啓發而懊惱不已。

雖說這次參訪我自己在研究思考上沒有得到具衝擊性的啓發，但在有關未來的學術合作及對於澳洲的理解上，卻有很具體的收穫。至少，Fox及Mosko教授都同意未來雙方繼續尋求研究及教學合作的可能性，包括交換學生、訪問、研討會、乃至於出版等。Mosko教授更積極地希望能將這次工作坊所發表的論文，進一步修改出版，特別是加上與大洋洲民族誌的比較，並由他與我來寫導論，以便把台灣南島民族與大洋洲民族誌的相同或關連處，以及台灣獨特的歷史發展經驗所產生的特性呈現出來，以彌補及銜接雙方已有的鴻溝。而台灣駐澳大利亞代表處也希望，2008年與澳方討論雙方科學與技術合作時，我們能提出進一步的合作計畫。

對於澳洲社會文化的理解，雖然因為安排住在ANU校園而受到很大的限制，但還是讓我看到幾點有趣的現象。第一，他們的世界地圖是以南半球在上方，而與我們平常所看到以北半球在上方的地圖不同。這不僅呈現其以太平洋乃至澳洲為中心的企圖，以擺脫美國或西歐為中心的世界觀，更突顯出其自信與爭取世界發言權的立場。事實上，電視節目中，更易看到取笑美國的言論。台灣駐澳代表處的林松煥代表請吃飯時也提到，美國留澳學生人數為澳洲留美學生的三、四倍，美方正積極尋求達成平衡，由此可看出這兩個國家此漲彼消的情況。其次，澳洲未來的發展潛力更因其有寬大的心胸而不可忽視。像其六個電視台中，有一台會直接轉播各主要國家的新聞（如英國BBC、中國的中央電視台、日本的NHK、美國的CNN等）外，還有一個電視台專門播放非英語影片（我看到有日本、北歐等）。而Fox教授或澳洲使用the Austronesians一詞，不像夏威夷人類學家只用大洋洲或太平洋，能以更寬廣的視野討論南島民族（至少，這樣可包括東南亞與台灣），便是一具體證明。其他如國家博物館不僅免費，四分之一展示土著文化，其餘四分之三則一再表示對於土著的歉意。處處顯示其在教育下一代的寬容與謙卑。我相信

這個國家將會是這個世紀的強國之一。第三，澳洲到處都是蒼蠅，他們卻以不用殺蟲劑而自豪。這與第三世界因貧窮而衛生不佳所導致到處都是蒼蠅的情形，大異其趣。正如同行的蔣斌所說，同樣是蒼蠅，但一個是代表文明的進步，另一個卻是代表文明的落後。這差別確實耐人尋味。不過，這個社會強調環保，卻也是事實。（雖然，它把煤、鈾等高污染的礦產賣給世界其他國家使用而顯得有點以鄰為壑）。不過，這個國家最吸引我的地方，卻是它春夏之際清冷的空氣，讓我頭腦清醒而身心舒暢，也讓我想起在英國同是春夏之際類似的天氣。也許，氣候多少還是會影響人的思考與身心狀況。

二、小國的空間：斐濟的探索經歷 (2/11-4/11, 2007)

由於在斐濟僅停留兩天，我們也僅計畫拜訪南太平洋大學負責「大洋洲藝術與文化中心」(Oceania Center for Arts and Culture) 的 epil Hau'ofa 教授及負責「太平洋發展及統治進階研究所」(Pacific Institute of Advanced Studies in Development and Governance) 的 Elise Huffer 教授，並順便參觀校區。很不幸，Hau'ofa 教授在我們到達的前一天因重病入院，使我們無法與他見面。不過，我們還是趁機參觀了這個學校，並在其書店買到不少該校出版的有關書籍。從書店的展示，我可以清楚看到他們所關心的議題。其中，有一個專櫃專賣有關土地權問題的書籍而可見一斑。第二天早上，我們與 Huffer 教授見面時，我便請教她幾個相關問題。其中之一是台灣的原住民委員會派人進修，因考量實用及行政上的需要，往往送到此地的南太平洋大學來學習。這個學校也以訓練當地政府官員而聞名，已在南太平洋其他許多島國設有分校。她對這事的意見如何？她認為如果是送到這學校政府系或政治系進修，是很糟糕的事，因斐濟的政府以腐敗聞名。若送到與人類學或發展研究有關的單位，情況會好些。由於她主要研究興趣與關懷是在文化產業的問題上，我便問她在面對新自由主義經濟的壓力下，她是否找到某種策略來解決當地文化與政經問題？她說這正是她目前關懷及要解決的問題，但還沒有答案。不過，唯一可以確定的，它必須放在更大的空間範圍來看，不能僅從斐濟本身來看。這包括以整個太平洋地區內各個地域間的關係及結構上的分工。她的論點與視野正與我的立場一致，也提醒了我在日後行程上考察的重點。

除了訪問 Huffer 教授之外，我印象比較深刻的反而是在斐濟參訪當地市場及農村的印象及感覺。由於 11 月 3 日是星期六，蘇瓦市場外擠滿了非法攤

販，大都是販賣自行生產的農業產品或魚獲。通常是一堆貨品才1或2元，很少有3元的。可知這些人只賺一些蠅頭小利而已。由於我自己少年時在市場賣過菜，我知道這種只能賺一點點小錢的心酸，而有種難以言喻的同情。尤其與第二天看到海邊被圍起來的高級住宅區相比，實在是天壤之別。另外，當地人對於外來觀光客的友善，反映著觀光旅遊業在當地的重要性。雖然，這事業的利潤往往不是當地佔多數的窮人所能分享到的，獲利的是少數資本家與政客。當地人自己也說，他們最大的收入，除了觀光外，是當地軍人去當聯合國維和部隊的收入。不過，在新自由主義經濟全球化發展的影響下，斐濟作為觀光旅遊的地區，其營收量在整個太平洋還是算很少而偏遠的



斐濟蘇瓦市場外賺取蠅頭小利的攤販

地區，沒能招引國際資金的注意而避免了這個國家為外力所主宰的局面，但也導致軍人干政與政府貪污腐敗，更因經濟利益有限而導致當地原有的菁英——印度後裔——的大量外移，使得其國內原有的有限企業跟著外移。惡性循環的結果，導致一般平民百姓更沒有其他工作選擇的可能性而更加貧窮。

在我們環南半部海邊的參訪中，有三件事令我印象深刻。一是即使在村落中的店鋪（特別是印度後裔所經營的商店），均裝上鐵窗以防被搶，由此可知其治安的問題及一般百姓窮困的程度，已到達隨時會搶錢的地步。二是路途中，我們參觀了一個較完整的傳統型村落，讓我印象深刻。它非常像馬凌諾斯基的《西太平洋航海者》一書中所描述的村落：中間是廣場，所有的房子都面向廣場而環繞著。進入村落參觀必須花12元買禮物（kawa的作物或已磨成粉狀者）送給酋長，並且得脫帽才能進入。我們先進到酋長的房子呈上禮物時，我便發現這島上居民的房子內部，表面上空無一物只有睡覺用的席子，但實際上屋內空間還是有內外之分。這在酋長家因屋樑上懸吊著一公尺高度分隔用的布簾而突顯出來（其他家都沒有）。原來進屋沿門直線到對面為界，右邊的空間只有家裡的人才可以進入活動，外人僅能在左邊有爐灶的空間活動。但家人在使用內部空間時，並沒有一定的位置或秩序，多少呈現其階級性相對於東加、大溪地、夏威夷等地，均較為鬆散。而墳墓就埋在

家屋前方或旁邊，因此往往沒有墓碑（晚近的才有），生者與死者其實並不遠離。當然，也有一些房子內部空間已開始改變。最明顯的便是外圍房子開始有一些分隔開來的個人房間出現，而有了私密性與個人主義的空間意涵。這空間的轉變讓我想起在蘇瓦看到家屋空間的轉換。這又涉及我所說的第三件事。

在蘇瓦市區，到處還是可以看到殖民時期留下來的房子與庭院。這類充滿殖民風的房子，不論平房或樓房，屋簷旁邊往往有延伸出來的長長走廊。這種空間結構在蘇瓦後來興建的房子中，繼續被轉換與發展。至少，我發現許多晚期興建的房子，每層樓旁邊上下都有多出來有如帽沿一樣的屋簷，但不足以成為走廊或陽台的建築結構。這讓我想起在花蓮新社所看到的撒奇萊雅及加禮宛人家屋類似的空間結構。這是否意味著這類多出來的建築結構，實際上均代表著或意味著殖民者與被殖民間的宰制與被宰制關係？只有待未來的研究來解答。

然而，在斐濟最讓我心動的，卻是路上遇到一位我們向他問路的老百姓，他在搭我們的便車並陪我們參觀途中，提到他們老百姓一直相信一件事：這國家的各種重要礦產（如金、銀、銅、鐵、煤等），因政府腐敗都自己消失在山中，一直要等到一個清廉政府出現時，它們才會再出現。在他充滿幻想與傳說色彩的述說後面，我看到當地人的純真與對人性的樂觀與信任。不像台灣，大部分人不僅不相信別人，甚至不相信自己，以致於失去對人性最起碼的信任與希望。

三、休憩吧！夏威夷 (4/11-8/11, 2007)

過了換日線來到夏威夷，一到機場，海關檢查雖嚴，但入境官員的和藹，讓我有些意外。這印象一直到離開夏威夷期間都沒有改變。它實標誌著這個以觀光為主要收入之地方對待外國旅客的基本態度。不過，由於一夜在機上未能睡好，我們急於到學校招待所休息。但下午我們還是去參觀Bishop Museum，由負責人類學部門的焦天龍博士帶領及解說，主要是焦博士第二天就要回中國大陸而不得不掌握這時間。這個屬於私人的博物館之所以那麼有名氣，除了開辦人的太太是當時夏威夷王國的公主，使得這博物館從一開始便得以收藏當地王室有關的器物服飾等而為其特色外，它後來又擴展到整個夏威夷及太平洋，包含一般平民歷史文物及當代藝術等，至今不僅仍是全

世界博物館中，有關夏威夷及太平洋南島民族歷史文物收藏中最豐富者，更重要的是它以強調當地土著觀點的立場著稱。也因此，它與夏威夷當地社區及各種社團密切合作，提供他們表演的空間及活動場地，間接也吸引更多的遊客。不過，依我的觀察，這個佔地並不十分寬敞的私人博物館，在無法依賴公部門的資源下，仍能維持、乃至於繼續發展，最主要的還是立基於夏威夷已成為整個太平洋的觀光勝地，以及西方對於太平洋或南海浪漫想像的櫥窗所帶來的廣大人潮。尤其它仍是美國的一州，更易吸引美國本土的觀光客。這個條件也可見於後面會談到的玻里尼西亞文化中心 (Polynesian Cultural Center)。

第二天早上，我個人先參與黃麗珍博士論文指導委員會的會議，討論她論文的研究計畫。之後，四位研究大洋洲的學者（包括系主任Geoffrey M. White, A. R. Arno, Alex Golub, T. P. K. Tengan）與我們所有成員一起交談與交換意見，並由系主任做一些簡報。整個過程讓我對於夏大人類學系有了概括的理解。簡單地說，這個系所似乎有兩個重要特點：一個是強調語言人類學，特別是論述分析 (discursive analysis) 成了該系師生研究上的主流。至於另一個特點，則是強調本土 (indigenous) 觀點的重要性。尤其在夏威夷，土著身份本身似乎就有它的力量。而違反這種「政治正確」立場者甚至無法在學界生存。像 *Cultural Identity and Ethnicity in the Pacific* 一書的第一主編，Jocelyn Linnekin 便因學術立場與當地本土學者立場衝突而被迫離開夏大，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在這種氛圍下，自然影響學術討論的氣氛與深度，更不用說對於學術上的創新與突破。比如，像澳洲人類學會這次大會的主題，*Transforming Economies, Changing States*，是與目前正在發展的新自由主義秩序，而和所有的人都息息相關的主題，也是目前國際學界正在發展的新課題，我卻無法在人類學系教師裡找到有相關專長的學者。這類問題不僅見於麗珍的論文指導委員會會議上，也見於下午的圓桌會談。

下午的圓桌會談，由於只有一個半小時，扣掉發問與討論時間，每個人僅有十到十二分鐘的報告。我們決定將每人報告的問題略加調整，避免過去細緻民族誌的報告而著重研究課題的提出。除了蔣斌、陳文德、黃宣衛仍繼續談他們原有的題目外，我的題目改為 “The Impact of Neo-liberalism: The Formation of New Local Societies”，童元昭則談 “Pacific Studies in Taiwan”。正如預期，報告後幾乎沒什麼討論，唯一的爭辯發生在語言學家 Robert Blust

與人類學家Alex Golub之間。主要是後者質疑‘Austronesian’這樣的分類是否有意義？但對於語言學家而言，這卻是毫無疑問的。事實上，Blust教授爲了第三天11月6日早上我們在他系裡有關會談主題而與我協商時，便已觸及類似的問題。他原希望我們介紹有關台灣原住民的文化人類學研究，但我則建議討論語言與族群的問題。我的理由是在台灣研究原住民族群時，往往假設語言與文化或族群的一致性。但事實上，這種來自台灣語言學家的假設卻是有問題的。比如，北賽夏族日常生活講泰雅族語，而南賽夏則講客家語。我很想就這兩個學科重疊的課題進一步討論。但他卻婉拒了。最後妥協的結果是由蔣斌先回顧文化人類學有關台灣南島民族的研究，然後由黃宣衛談撒奇萊雅由阿美族分出正名爲一個新的族群運動所呈現語言與族群間關係的問題。討論過程中，還是以黃宣衛報告所引發的問題爲主，但我還是無法由語言學家那裡學到不同的啓發性觀點。也就是說，我們在夏大的兩次演講，顯然比在坎培拉更沒能激起迴響。雖然，比較之下，在夏大的演講或談話，同仁（除了我以外）因幾次的經驗後，顯然進步了許多。

在知識交流上雖沒有得到預期的結果，不過，還是建立了友好關係，可爲未來進一步的合作打開一扇窗，特別是與夏威夷的比較研究。正如同行的黃宣衛所說，夏威夷的土著人口在比例上，比台灣原住民在台灣人口總數還少，但地位卻出奇地高。爲什麼？這是很值得做比較研究的問題。我個人覺得比較有意義的收穫，是參觀玻里尼西亞文化中心。由於這文化園區是台灣各種文化園區模仿的對象，使我特別好奇。但只花了兩個多小時，便參觀完

了整個園區。其實，就面積、規模、乃至於重建供參觀的太平洋各地區代表性房子而言，均比不上台灣九族文化村或屏東瑪家文化園區的精確與顧及生態環境的配合與考量。但這個文化園區參觀的人數，在夏威夷僅次於珍珠港。其成功理由，並不在於它的設備、經營管理多好，而是它佔了夏威夷做爲整個太平洋地區觀光旅遊中心的地利



玻里尼西亞文化中心

之便，吸引了國際資金的投入，帶來足夠維持其商機的觀光人潮。在這裡，我們可以輕易看到由美國大陸來的老夫妻或全家福。也因為參觀者是帶著觀光旅遊的心情，園區內的表演者，也很容易得到觀光客的參與與迴響，更炒熱了整個園區的氣氛，就如同來到Waikiki衝浪海邊的人潮，很容易塑造出這個觀光勝地的名聲一樣。更因為國際資金的湧入，使得各種國際力量匯集於此而相互競爭，也使國家乃至於特定人群組織的宰制性難以建立與維持，導致這個地方似乎除了休閒之外，沒有其他重要的事。就如同這幾個非週末假日的晚上，即使我們住在校園中，還是不時在半夜聽到學生在校園喧鬧的聲音。這是在哈佛、倫敦政經學院、乃至於澳洲國立大學不曾碰到的事。這特色相對於處於結構邊陲的斐濟，更明顯而一目了然。看來，新自由主義經濟下，應該是有其不同於過去資本主義世界的核心/半邊陲/邊陲結構的另一種結構存在。

另一個吸引我們注意的是第四天參觀夏大圖書館有關太平洋文化的收集。負責人Karen Peacock在此工作二、三十年，以館藏包括各種語言文字、乃至於影像聲音資料豐富而為世界之冠而自豪。除了觀光，這也是許多美國本土、國外學者喜歡來此的另一主因。看來，這是另一種文化資本。

8日早上四時起床，以便趕上七點多的飛機直飛台灣。在外跑了兩個星期，顯然大家都累了，也開始想家。望著計程車窗外屬於太平洋潔亮的星空，心中覺得這趟太平洋之行，還是值得的。至少此行使我更確定了目前要處理的兩個主要問題：如何理解新自由主義經濟衝擊下地方社會的「文化」與「族群」？而在這變動快速、不確定性又高的新秩序下，心靈的焦慮、疏離與寂寞、對人的不信任等，均是普遍存在的現象（包括西方在內），但我們似乎又看到不同文化有不同的解決方式。顯然文化仍有其角色。這些觸及人類心靈深處的文化，不僅反映出當代文化混和及分隔化(compartmentalizing)的特性，也同時反映著時代精神而尋求解決之道。這已經無法依賴過去的觀念與理論所能夠回答，我們必須尋找新的知識觀念來面對當代新的現象不可。只是，我更知道我要找到答案的地方，不是在太平洋，而是在台灣。因此，我心理期盼著早些回到台灣。